



《诗经》邶风、鄘风、卫风 地域文化生态考论



王志芳 著

海外學

齊魯書社



《诗经》邶风、鄘风、卫风 地域文化生态考论

王志芳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邶风、鄘风、卫风地域文化生态考论 / 王志芳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9.8

ISBN 978-7-5333-4161-9

I. ①诗… II. ①王…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78582号

《诗经》邶风、鄘风、卫风地域文化生态考论

SHIJING BEIFENG YONGFENG WEIFENG DIYU WENHUA SHENGTAI KAOLUN

王志芳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i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2千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4161-9

定 价 45.00元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自序

2008 年秋，在参加于圣人之乡曲阜召开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2008 年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年会时，我有幸结识了邵炳军先生。邵先生不嫌弃我学识孤陋、闻见寡薄，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令我能够在美丽的上海大学逗留两载又三个月，跟诸位同门一起研读《诗经》。于纷繁嘈杂之际能够学着体味“诗三百”这曲鸣自天籁的“一片好音”，实在是一大幸事。

做《诗经》相关课题的同门或研读一“风”，或研读数“风”，我关注的内容是《邶风》《鄘风》《卫风》三“风”，需要在详细剖析以《邶风》《鄘风》《卫风》为代表的卫地诗歌产生的地域与时代、自然环境特质、文化组成与积淀的基础上，把握三“风”各篇诗歌的诗旨、题材、语言、情调、艺术手法、意象内涵等方面的地域性特色，总结概括卫地文化区的地域文化生态特征。这需要关注文物考古、艺术考古、民俗研究的成果，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文字文献与民俗调查相结合，以诗证史，以史考诗，内外相证，古今参证，立体性地还原黄河、淇河流域卫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展现卫人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历史原貌。

《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皆非同一般。我们通过考析“诗三百”诸地域人们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环境以及诗人的文化品性和心灵世界，既可以感受《诗经》的美，又能够感受《诗经》的真，从它独特的文学个性和广博的文化精神中体味其永恒的魅力！

前 言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体制不同，经济状况相异，风土习俗不类，地理特征有别，致使不同地域文化的美学特征表现出各自的地域性。《诗经》反映了殷商、西周、春秋等几个阶段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期。《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邶风》《鄘风》《卫风》三“风”产生在黄河、淇河流域，其地域特征的形成与属于周代河淇文化区的卫地域文化生态有着密切联系。

卫地是殷商王畿故地，殷商余民中的贤哲多居于此，则卫地拥有殷商文化的精华。这是卫地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周取代商后，商、周两种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存同行。卫地文化须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仍保留殷商遗风，是历史传承，世俗流移，殷习尚见。另一方面是被康叔之化，是时世规范。在允许殷商遗俗存留的同时，周王朝礼乐治国的理念也必然会以适当的方式被卫地的统治者推行，并以一定的形式体现在卫地民众的生活中。

殷商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尊神敬鬼，重视卜筮。占卜在周人生活中的地位与殷人几乎事事问卜的情况相比虽然是逐步下降了，但西周时期占卜活动仍然比较兴盛。卜筮习俗见于《诗经》十二篇中，这十二篇涉及卜筮的诗歌除了“小雅”“大雅”，在十五国“风”中只见于《鄘风》和《卫风》，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殷商卜筮习俗在卫地的遗存。

敬鬼神，则歌舞娱之。在诸多娱神的乐舞中常见于典籍的是万舞，万舞一直被先民经夏历商而舞至周代。《诗经》中除了颂诗和雅诗中提到万舞，《邶风》中的《简兮》对万舞予以相对具体直观的描述。

卫乃“声色”之地，此处的“声色”之地是指歌舞美色、货财辐辏之地。经济繁荣之乡，则声色生、声色盛。卫地诗篇表现出比较原生态的未受或少受礼教浸染的自然淳朴之风，蕴含较大胆、自由、开放的气息。

卫国是西周、春秋时期著名的君子之邦，被誉为“国多君子”，国中诸多君子的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有德之人。这表明了周人对殷商尊神敬鬼天命观的反思：他们不再是“率民以事神”，而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思想领域从重神事转向重人事、从神治走向德治的变化，是思想意识的一种明显的进步。

与尊礼重德的君子之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卫地习俗中的另一面：“薄恩礼，好生分。”“豪桀”侵夺、民性刚强是存在于卫地的一处明显的特征，相比于其他地域而言，卫地的世风不够醇厚，“俗刚强”，其人性情偏于刚暴怨戾，若《邶风·谷风》《邶风·日月》《邶风·终风》《卫风·氓》中的男子。不循礼甚至严重违礼的现象常见于卫地，上层统治者尤甚。在位者的种种与礼不符的言语举止影响甚坏，流弊颇深，卫地民众化之于上，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寡恩少礼之举。

习俗文化受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某处地域文化形成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传承性的特点，它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稳定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沿袭传承。朝代的更替和制度的变革，又为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可能。在接受商文化传承和周文化浸润的背景下，卫地形成了地域文化特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征。

邶、鄘、卫三“风”之主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对婚恋生活的全面映现、对非礼之举的深厉讥讽和对女性形象的集中写照。

婚恋诗丰富的特点在邶、鄘、卫三“风”中表现得很突出，这些诗言及幽期密约、赠遗达情、婚期选择、思亲念远、无辜遭弃、悼亡哀故以及当时的婚姻形态等婚恋生活的诸多环节、诸般境遇和诸项制度，相对全面地映现了《诗经》时代人们的婚恋生活。

《诗经》通过美刺的方式以诗歌的形式关注社会、干预生活，然后鉴定善恶、评判得失，表达赞美讥讽之意。刺诗表现出了政治关怀和道德关注，是忧患意识的体现。在卫风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内，自卫庄公教子无方导致州吁之乱至卫懿公好鹤误政被狄人所灭，卫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其间的种种违礼乏德之举往往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相对于其他国风而言，卫风记叙和塑造了较多女性形象。这些女子或华服美饰、容貌艳丽（《鄘风·君子偕老》《卫风·硕人》），或天真活泼、热情主动（《邶风·静女》《卫风·木瓜》），或思深念久、意重情浓（《邶风·终风》《邶风·击鼓》《邶风·雄雉》《邶风·简兮》《卫风·伯兮》《卫风·有狐》），或心志坚定、不甘屈服（《邶风·柏舟》《鄘风·柏舟》），或见高识卓、思慕宗国（《邶风·泉水》《鄘风·载驰》《卫风·竹竿》），或勤以持家、善以待人（《邶风·绿衣》《邶风·谷风》《卫风·氓》），可以说是女性形象的集中写照。

同卫地域文化的二元化特征相近，卫风在主题的展示上也体现出二元性的特点。诸篇诗作不是某一主题的单向度映现，而是对《诗经》时代社会生活的立体化、真实性的描述，既有远古文化气息的影响和遗存，如桑林在功能上由祭祀之地到欢会之所的

转化、烝婚习俗在卫宣公与夷姜和公子顽与宣姜婚姻中的再现、卜婚习俗于《卫风·氓》中的延续等。同时，这些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诗篇带有明显的时代标识，最能体现这一时代标识的是周礼对《诗经》时代人们生活诸方面的规约，如与婚前恋人之间可以享有城隅之期、林下之欢的自由相比，无论从谈婚论嫁的礼节上还是从婚后的言行上，婚姻给人们的限定是十分严格的，六礼之制在此时期形成并完善，尤其是其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礼俗的社会规约作用可谓是持久而深远的。用周人的礼乐治国之道来衡量卫国国君的治国实际，在卫武公之后卫风绝大部分诗篇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内的卫国国君，特别是庄公、州吁、宣公、惠公、懿公等国君，可圈点处甚微，当讥讽处颇多。

卫风既具备《诗经》总体的艺术特征，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重章复沓的章法、以四言为主的句式、丰富多彩的语言等，又具备卫地诗歌特有的艺术特征，在情感格调上表现为情深文挚，美哉渊乎；在对女性体貌描写上能够充分运用精练简洁的语言达到细致化的效果；以《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为代表的诗篇表现出明显的故事化特征；博喻的运用以及运用的频繁化，使得卫风在比这一艺术手法上于诸国风之中尤显突出。此外，“愿言”“终……且……”等独有的语词和句式、思妇二重心理的并述、不同诗篇中相同诗句的频现、婚恋习俗兴象的丰富等，都体现了卫风诗篇的独特之处。

乌、蜩螗、竹是卫风中具有典型性或独特性的意象。

从被灵异化、被道德化、被用以征兆吉凶等方面对乌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乌意象寓意的丰厚和复杂。这些寓意源于神话、传说、习俗、信仰等多个方面。历代研读者对《邶风·北风》“莫黑匪乌”中的“乌”，从比喻和征兆两方面来理解得比较多。由于对诗旨的认识不同，从本体乌出发，产生的喻义和象征义也有

很大区别。《邶风·北风》中的乌不是妖异不祥之物，而是祥瑞之兆。

人们在对蝥蛸形状和色彩类比联想的同时，又赋予其谏纬、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比附象征意义，因而形成了蝥蛸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姿。蝥蛸意象具有了连类比附的多样性、预兆功能的双面性、象征意蕴的多义性等特征。历代学者基于对《邶风·蝥蛸》诗旨的不同认识，对蝥蛸比喻、象征意蕴的感情倾向有别。《邶风·蝥蛸》中的蝥蛸是婚姻吉祥、两性欢好之象。

在万千草木中，竹以特有的形色和质地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和特别的审美价值，人们将竹与君子、神龙、图腾崇拜、仙道佛、隐者高士、祛病疗疾、民间习俗等联系在一起，将竹作为伦理观念、道德标准的载体，《卫风·淇奥》以“绿竹”起兴盛赞卫武公就是典型的实例。

乌、蝥蛸、竹是邶、鄘、卫三“风”中三个相对独特的诗歌意象，在具体诗篇、文本语境中呈现出各自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蕴涵丰富的意象来感受卫地诗歌，体味远古时期的文化气息。这些意象为后世乌文化、蝥蛸（虹）文化和竹文化的构建和充实奠定了基础。

目 录

自 序	/ 1
前 言	/ 1
绪 论	/ 1
卫风与《卫风》	/ 4
第一章 卫地域文化生态考论	/ 10
第一节 卫地域范围与卫国发展概况	/ 14
一、卫地域范围	/ 14
二、卫国发展概况	/ 20
第二节 卫地域文化	/ 26
一、卜筮之风	/ 30
二、万舞之俗	/ 39
三、声色之地	/ 43
四、君子之邦	/ 50
第二章 卫风主题考论	/ 66
第一节 对婚恋生活的全面映现	/ 66
一、幽期密约	/ 66
二、赠遗达情	/ 72
三、婚期选择	/ 74

四、思亲念远	/ 79
五、无辜遭弃	/ 83
六、悼亡哀故	/ 94
七、烝婚遗俗	/ 96
八、媵婚之习	/ 104
九、同姓不婚	/ 109
十、六礼之制	/ 114
第二节 对非礼之举的深厉讥讽	/ 120
第三节 对女性形象的集中写照	/ 131
第三章 卫风艺术考论	/ 147
第一节 情深文挚，美哉渊乎	/ 147
第二节 对女性体貌描写的细致化	/ 162
第三节 叙事述情，故事性强	/ 179
第四节 取用博喻，不一而足	/ 184
第五节 其他艺术特色	/ 191
一、独有的词语和句式	/ 191
二、不同诗篇中相同诗句的频现	/ 193
三、思妇二重心理的并述	/ 195
四、婚恋习俗兴象的丰富	/ 198
第四章 卫风意象考论	/ 202
第一节 乌意象	/ 204
一、《邶风·北风》中“乌”喻义诸解	/ 204
二、乌意象文化内涵考	/ 210
三、再回到《邶风·北风》中的乌	/ 223
第二节 蛩蜎意象	/ 226

一、虹文化内涵考	/ 227
二、《邶风·蟋蟀》中“蟋蟀”意象解	/ 239
第三节 竹意象	/ 243
结 语	/ 268
参考文献	/ 270
附 录	/ 294

绪 论

《尚书》《左传》《国语》《周礼》等典籍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诗经》卫风地域文化，最早评价卫风地域风格基本特征的是春秋时期的吴公子季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聘鲁观乐，他听至《邶风》《鄘风》《卫风》时，感叹：“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此乃季札从诗乐结合中体味出的卫风地域性特征，他这种评点式文学阐释对后世国风地域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毛诗序》、毛公《传》、郑玄《笺》对卫风所涉及的地域性皆有评点，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汉郑玄《诗谱》对《诗经》各国风地域性的阐述更为详细，郑玄在排列《诗经》世次的同时，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诗经》国风产生地域的历史沿革及其地域文化特色，后世治《诗经》者多遵从其说。元陈绎曾《诗谱》在季札评论的基础上言《邶风》：“君子处变，渊静自守。”明戴君恩《读风臆评》、明孙鑛《批评诗经》、清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对卫风地域性特征都有精练简洁的评点之语。秦汉以降，地域文化的研究整理著作成为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地方史志的形式表现。诸多地方志中有不少描述卫地域文化或河淇文化的内容，且其地域文化的色彩比较浓厚。古代学者治《诗经》多从经学角度着眼，对《诗经》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的关注尚不够充分。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诗经》的研究逐渐从经学转向文学,将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了《诗经》的研究中,开始对十五国“风”的地域性特征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观照。具体到对卫风地域性的关注,可见于谢无量的《诗经研究》和傅斯年的《诗经讲义稿》,他们都注意从地域环境角度去考察国风的地域风格特征,对探求卫风地域文化生态与地域性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以来,《诗经》国风地域性特征与地域文化生态研究领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涉及卫地域性特征的文章和著作比较多,如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高亨《诗经鄘风新解》,林祥征《〈诗经〉与民俗》,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陈春保、高金生《〈诗经〉——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赵俪生《试说卫风与卫国》,王以宪《〈诗经〉中的“弃妇诗”与“逐夫诗”》,华锋《论〈诗经〉的道德意识》,毛忠贤《试论卫齐风诗中原始婚俗的残余》,王洲明《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郭晋稀《风诗蠡测》,邵炳军《〈诗·邶风〉系年辑证——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三》,冯洁轩《论郑卫之音》,张启成、王伟《论〈邶〉〈鄘〉〈卫〉三风》,王永宽《论淇河文化的临界文化特征》,陈艳霞《〈诗经〉邶、鄘、卫婚恋诗管窥》《地域文化与〈诗经〉邶、鄘、卫三风研究》,宋力《“郑”“卫”情诗之比较》,魏秀艳《〈诗经〉风诗的地域与民俗》,王静悦《〈诗经·卫风〉独特风貌之成因》,侯文学《齐宋郑卫之音的东夷文化特征——兼论季札、子夏、师乙的审美观》,邱奎《美哉渊乎 忧而不困——〈诗·卫风〉地域风格研究》,范瑞红《殷商王畿故地〈诗经〉“风诗”与殷商文化》《〈诗经〉中郑卫之诗民俗文化

略论》，董雪静《殷商地域文化与〈诗经〉恋歌》，别亚飞、张永红《从〈邶风〉〈鄘风〉〈卫风〉探卫国之民风》，谢竹峰《〈诗经〉卫诗民俗研究》，李勇《卫地风诗与商周礼俗研究》等，可谓代表作，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邶、鄘、卫三“风”的地域性特征。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学者的一些成果，如李辰冬《诗经研究方法论》，熊公哲、黄永武、裴普贤等《诗经论文集》，林庆彰《诗经研究论集》（一、二）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诗经》国风地域性特征与周代地域文化生态问题。

国外的《诗经》研究涉及《诗经》和《诗经》某一部分诗篇地域性的论著数量较少，其中以法国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日本白川静《诗经研究·通论篇》等为代表，此外尚有日本白川静《诗经国风》、日本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韩国吴万鍾《〈诗经·邶风·谷风〉与〈卫风·氓〉之比较研究》等作品，但均较少涉及周人的地域文化观念，亦没有从文化生态类型视角去研究《诗经》的地域性特征。